

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传播情况之初探

盖晓明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探讨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的传播情况,可以发现:东吴是浙江佛教的良好发轫期,西晋为浙江佛教的相对回落期,东晋乃浙江佛教的重要发展期。东吴、两晋时期浙江佛教的主要特点有: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正比关系;佛玄融合的文化景观;奠定了浙江佛教的“义学”特质。

【关键词】东吴;两晋;浙江;佛教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 (2012) 04 - 0013 - 05

本文对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的传播情况及这一时期浙江佛教的主要特点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佛教在浙江的早期传播暨东吴时期佛教在浙江的传播情况

一般认为,汉明帝在永平年间(58-76)遣派使者往西域求法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永平求法的传说最早出现在《牟子·理惑论》中,六朝著述多有述及者。对于永平求法传说,汤用彤先生有言:“吾人现虽不能明当时事实之真相,但其传说应有相当根据,并非向壁虚造。至于佛教之流传,自不出于东汉初叶。”据汤用彤先生考证,“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其无可疑者,即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1]20-34}也就是说,据可信记载,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汉哀帝时,即在公元前2年。汉代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土。大月氏、康居两国由陆路向华传播佛教,必经凉州、长安等地。安息国虽与汉人有海上贸易,但是否经由海路传入佛教,史书阙载。早期佛教,主要流布于长江以北。至永平十三年(71),汉明帝(刘庄)之弟楚王英(刘英,此人为佛教信徒)因罪废徙丹阳泾县(今安徽省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随从刘英南徙者数千人,其中多有佛教信徒。这或许是佛教较广泛流布江南的开始。

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沿着商贸路线流布。美国汉学家芮沃寿认为:“西北的贸易中心敦煌早期是一个佛教中心,在长安和洛阳,在山东南部和安徽,在长江下流,在现在的武昌附近,都有早期佛教团体存在的证据。在遥远的东南海岸,印度商人将佛教带到了中国的边远地区交州。”^{[2]32}

浙江既不直接属于长江流域,也远离于东南海岸,因此佛教传入浙江与佛教早期流布的商贸路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现存的文献看,佛教传入浙江时间是在东吴时期。

梁代僧祐《出三藏记集·安世高传第一》记述了安清(安息国人)于灵帝末年杖锡江南的事迹。他到过广州,然后又到会稽,验证自己此前所说“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的“三世有征”的佛理。^{[3]509-510}据此记载,早在汉灵帝时就有著名高僧在浙江境内从事佛教活动了。但安清的事迹,传说的成分多于史实。梁启超虽然把安清的佛教活动作为佛教最先从海路传入汉

收稿日期:2012-04-05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0907866)。

作者简介:盖晓明(1960-),男,浙江杭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E-mail: gxm54103@163.com

土的证据，但亦言“其事迹多诡诞，不可尽信”。^{[4]34}

《出三藏记集·康僧会传第四》中有言：“时孙权已称制江左，而未有佛教。”待到康僧会烧香礼请得到舍利之后，孙权“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3]513} 慧皎《高僧传》除基本复述僧祐的《康僧会传》之外，还有一句：“时吴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汤用彤校注：“《祐录》无‘时吴国……矫异’十八字。”^{[5]19} 汤先生这个校注，可能有这样的意思：《高僧传》所云僧会“以吴赤乌十年（248）初达建业”，又云支谦于汉献帝末年（190-220）“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5]15} 这充分说明“时吴国……矫异”18字的记载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祐录》中并没有这18个字。总之，根据僧祐、慧皎两位佛教史大家的记载，江南佛教始传于孙权之时。

至于佛教传入浙江的时间，《重修浙江通志稿》有相关的文字：吴时浙江已建有寺院九所，分别是：

1. 金粟寺，在海盐，吴赤乌中康僧会建（据明《宋濂集》）。
2. 通元寺，在海盐，吴大帝夫人舍宅建（据唐《吴地记》）。
3. 普济教寺，在慈溪，吴赤乌二年吴上都乡侯阚泽舍宅建（据明《宁波府志》）。
4. 资福寺，在天台山，吴赤乌二年建（据明《天台山方外志》）。
5. 翠屏庵，在天台山，吴赤乌中建，周禅师居此（据明《天台山方外志》）。
6. 正德院，在嵊县，吴赤乌二年建（据明《嵊县志》）。
7. 兴福寺，在黄岩，吴赤乌中建（据宋《赤城志》）。
8. 宝轮寺，在黄岩，吴赤乌中建（据宋《赤城志》）。
9. 广孝寺，在黄岩，吴赤乌中建（据宋《赤城志》）。^{[6]12}

以上是唐、宋、明各时期对佛教早期在浙江建立寺院情况的记载。如果以建立佛寺为佛教传播的重要标志，那么，根据这些记载，佛教传入浙江的时间应该在吴大帝赤乌年间（238-251），而且佛教在浙江建立寺院，至迟不晚于赤乌二年。

对于东吴时期佛教在浙江传播的情况，笔者想要说明以下三点看法：

其一，赤乌二年建寺可疑。据《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康僧会于赤乌十年（248）初达建业，吴国最早的寺院为建业的建初寺，建成时间最早的可能性即是康僧会到达建业的当年——即赤乌十年（248），而以上地方志所谓建于赤乌二年的寺院，在建寺具体年份上仅是传说而已，颇可置疑。

其二，海盐金粟寺为浙江建寺之始。如果明儒宋濂《太平万寿寺记》所述是有根据的，那么海盐的金粟寺，当为浙江寺院建立之始。其所谓“吴赤乌中康僧会建”，与《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等文献并无牴牾。赤乌共有14年，康僧会抵达建业后的4年时间里，在建业和离建业不太远的海盐等地建立寺院，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完全可能的。笔者推测：海盐之所以会成为浙江首所寺院的建立地，可能与孙权的徐夫人废处吴郡且归依、赞助佛教有关（详见下文）。

其三，通元寺或为徐夫人舍宅而立。通元寺原作“通玄寺”，《吴地记》作“吴大帝孙权吴夫人舍宅置”。《重修浙江通志稿》曰：“吴大帝夫人舍宅建。”今查《三国志·吴书》，孙权有六位夫人，并没有吴姓的夫人。孙权母亲为吴夫人，且为吴郡人，但她薨于建安七年，彼时佛法未至吴国，所以，《重修浙江通志稿》对《吴地记》的修改是对的。在孙权六位夫人中，唯徐夫人为“吴郡富春人也”，其他五位夫人皆非吴郡人。据《资治通鉴》：“（明帝景初二年）九月，吴改元赤乌。吴步夫人卒。初，吴主为讨虏将军，在吴，娶吴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贱，吴主令徐氏母养之。徐氏妒，故无宠。及吴主西徙，徐氏留处吴。而临淮步夫人宠冠后庭，吴主欲立为皇后，而群臣议在徐氏，吴主依违者十余年。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绶，徐氏竟废，卒于吴。”^{[7][2338]}可以推测孙权夫人中最有可能在海盐有大宅第并最有可能有意向捐舍造寺的，应该是徐夫人。徐夫人的归依、赞助佛教，使康僧会在海盐建立寺院（金粟寺）甚得地主之谊。

二、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传播之情况

据《重修浙江通志稿》，两晋时期浙江共建造新建寺等 55 所佛寺。

（一）西晋浙江佛教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西域僧幽闲在新昌建造新建寺。惠帝永康年间，云游僧义兴在鄞县创立天童寺。愍帝建兴二年（314）佛图澄在于潜（今临安）建造乐平寺。此外武帝时临海建涌泉寺，惠帝时山阴建灵宝寺，余杭建天禄寺。从西晋灭吴（公元 280 年）至西晋灭亡（公元 317 年）的 37 年间，浙江境内共建以上 6 所寺院。

西晋浙江佛教可关注者两点：第一，西晋统治浙江至其灭亡的 37 年间，浙江境内共建佛寺仅为 6 所，远不及孙吴赤乌十年至其灭亡的 32 年间浙江共建佛寺 9 所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晋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在北方洛阳，另一方面与西晋统治者及士族阶层比较重视儒学及玄学而少有崇信佛教者有密切关系。第二，关于佛图澄建乐平寺的说法似可商榷。咸淳《临安志》云：常乐教寺，在县南五十里长安乡，旧名乐平，建兴二年佛图澄建。今查《高僧传》佛图澄本传，佛图澄“以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适洛阳，志弘大法”。“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泽草野，以观事变。时石勒屯兵葛陂（今河南平舆县东北），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5][345]}据《资治通鉴》，石勒屯兵葛陂为永嘉五年（311）。佛图澄“潜泽草野，以观事变”在永嘉四至五年之内，彼时于潜乐平寺尚未建造。而永嘉五年之后，直至佛图澄逝世（晋穆帝永和四年），据《高僧传》所载，其活动范围一直都在北方。特别是在建兴二年前后，他正在豫州忙于道化石勒，到于潜来建立寺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二）东晋浙江佛教

东晋时期是浙江佛教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据《重修浙江通志稿》，东晋 103 年间，共建立祇园寺（在山阴县）等佛教寺院 49 所。与西晋时期浙江平均约每 6 年建寺 1 所相比，东晋时期浙江平均约每 2 年建寺 1 所，建寺频率高出西晋时期两倍之多。

第二，东晋时期浙江境内出现了大量有确切文献记载（而不仅是传说）的高僧活动。诚如上文所述，西晋时期佛图澄是否来过浙江，《高僧传》并没有明文记载，而咸淳《临安志》关于佛图澄在于潜立乐平寺的记载，在立寺时间上颇可怀疑。因此，关于高僧在浙江境内活动的明确记载，首推梁代慧皎所著《高僧传》。慧皎是会稽人，著述偏重于南方而简略于北方，若在东晋竺法潜之前确有高僧在浙江活动，他应该不会不给予关注的（他甚至将传说的安清活动于会稽的事迹载入其书）。

据《高僧传·晋剡东仰山竺法潜》：“竺潜，字法深，姓王，琅邪人……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宁中，潜恒着屐至殿内，时人咸谓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中宗肃祖

升遐，王庾又薨，乃隐迹剡山，以避当世。追踪问道者，已复结旅山门。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5]166}竺潜隐迹剡山（今绍兴嵊州）在王茂弘、庾元规死后。据《资治通鉴》，王导薨于晋成帝咸康五年（399）秋，庾亮薨于咸康六年（340）春。竺潜入剡，必在公元 340 年之后。这是高僧在浙江活动的最早的确切记载。

《高僧传·晋剡沃洲山支遁》：王羲之在会稽时，曾会见过支遁。不久，支遁“又投迹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5]160}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在永和年间，支遁在永和年间进入浙江活动，先在山阴，后居于嵊县仰山之侧沃洲小岭。

东晋时期活动于浙江的高僧，除竺法潜、支遁之外，还有剡山于法兰、剡白山于法开、剡葛岷山竺法崇、始宁山竺法义、于潜青山竺法旷、若耶山帛道猷、山阴嘉祥寺释慧虔（以上为“义解”僧）、剡隐岳山帛僧光、始丰赤城山竺昙猷、始丰赤城山支昙兰（以上为“习禅”僧）、山阴显义寺竺法纯（以上为“诵经”僧）等。

第三，东晋时期浙江境内活动的僧人与名士相互交流，佛学与玄学相互交融，使浙江不仅成为当时的文化重镇，而且成为佛教“义学”的重镇。此仅引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为证：“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则有高僧竺法潜、支遁林居焉。次又有……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盖人与山，相得于一时也。”^{[8]1440}此文基本反映了东晋时期浙江境内僧人与名士相互交流的情况和东晋时期浙江在“玄学”和佛教“义学”方面的重要地位。

三、东吴、两晋时期浙江佛教的概况和主要特点

对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传播的情况，可以做以下的概述：东吴是浙江佛教的良好发轫期，西晋为浙江佛教的相对回落期，东晋乃浙江佛教的重要发展期。

东吴赤乌十年至十四年间（248-251）是佛教最早在浙江建寺的时间。从东吴赤乌十年至吴国灭亡的 32 年间，浙江境内共建金粟寺等寺院 9 所之多，平均约 3 年多建寺 1 所。参与建寺活动的高僧康僧会、贵戚孙权夫人以及曾任孙权中书令、侍中、太子太傅的阚泽等。从建寺数量到参与其事者的社会影响力两方面看，佛教在浙江传播的发轫时期便呈现兴旺景象。

西晋灭吴后的 37 年间，浙江境内共建新建寺等寺院 6 所，平均约六年多建寺 1 所。参与建寺活动的有西域僧幽闲、云游僧义兴等，佛图澄在于潜（今临安）建造乐平寺的故事，据上文所述是可疑的。从建寺数量到参与其事者的社会影响力两方面看，西晋佛教在浙江传播相比于此前的东吴时期和此后的东晋时期，是一个相对回落的时期。

东晋 103 年间，共建立祇园寺等佛教寺院 49 所，与西晋时期浙江平均约每 6 年建寺 1 所相比，东晋时期平均约每 2 年建寺 1 所，建寺频率高出西晋时期两倍之多。东晋时期浙江境内高僧与名士会粹，佛学与玄学融合，无论从其建寺数量及参与建寺者的社会影响力而言，还是从其对佛教“义学”所做的特出贡献而言，这一时期都可称得上是浙江佛教的重要发展时期，其对后来的浙江佛教具有深远影响。

现对东吴、两晋时期浙江佛教的主要特点做以下三方面阐述：

第一，东吴、两晋时期浙江佛教的传播、发展，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适成正比关系。东吴时期浙江境内共建寺 9 所，除通元寺未标明建寺年号外，其他 8 所中的 3 所（普济教寺、资福寺、正德院）标明为赤乌二年所建，5 所（金粟寺、翠屏庵、兴福寺、宝轮寺、广孝寺）标明为“赤乌中”所建。“赤乌”共 14 年，东吴 9 所寺院除通元寺未详建寺时间段外，其他 8 所皆建于“赤乌”年间。赤乌年间是东吴由盛转衰的时期。孙权立国之后，经黄武、黄龙、嘉禾近 20 年的经营，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较好的发展，虽然赤乌后期孙权因年迈意荒，政事不济，但此前的功业毕竟犹有余泽。政治、军事的相对稳定，经济的相对发展，都为浙江的佛教活动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氛围和物质基础。

西晋时期浙江境内共建寺院 6 所，其中武帝太康年间 2 所（新建寺、涌泉寺），惠帝永康年间 3 所（天童寺、灵宝寺、天禄寺），愍帝建兴年间 1 所（乐平寺）。西晋政治、文化中心在北方洛阳，同时西晋统治集团较少关注佛教，这是西晋时期浙江境内较少建立寺院的主要原因。晋太康年间，政治、经济等比较稳定，浙江境内建寺 2 所。晋惠帝永康年间，正值八王之乱，但八王战乱的地域主要是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其与浙江最为接近者为浙江西北之淮南（淮南王司马允）和西南之长沙（长沙王司马乂），皆与浙江有所阻隔。浙江的相对艾安，故有可能建寺 3 所。

东晋时期，汉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重心被迫移置长江以南。江苏、浙江同属扬州，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彼时文化名人居住在浙江者甚多，加之玄学与佛教相互融合，以至东晋时期浙江境内佛教大盛，一百余年间建寺 49 所之多，高僧名士在此活动者十分频繁。

第二，东吴、两晋时期浙江佛教与魏晋玄学水乳交融，佛教高僧与玄学名士相互周旋，构成了这一时期独有的佛玄融合的文化景观。东晋之前，玄学主要流行于北方。《宁波府志》谓东吴的阚泽曾舍慈溪宅第建为普济教寺。阚泽很有学问，但所专擅者为儒学，无涉玄学。西晋时活动于浙江的高僧、名士甚少，鲜有佛玄交流的文献记载。玄学随司马朝廷渡江而南移。浙江佛教佛玄融合的文化景观当起始于咸康六年（340）之后竺潜入剡之际。竺潜本传云：“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所谓“方等”与“老庄”、“内外兼洽”等，正说明竺潜所从事的佛教活动具有佛玄交融的特点。

据《世说新语》：“《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9]223} 又据刘孝标注及《晋书》，支遁在余杭山（今苏州）白马寺时，就以佛学价值论批评玄学家向秀、郭象的价值虚无论，以佛学理论超越玄学理论。支遁到浙江后，与名士许询等周旋甚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9]227} 这是僧人与名士交流、佛学与玄学交融的典范。

僧人籍老庄敷演佛理，名士亦籍佛理表现玄学。孙绰《游天台山赋》是一篇典型的籍佛理以喻玄义的辞赋。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许询、孙绰“又加以三世之辞，而风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9]262} 东晋时期的最有影响的玄言诗，往往玄学与佛教相互交融，改变了传统诗歌的体势、风格。

第三，东吴、两晋时期的浙江佛教奠定了浙江佛教“义学”的特质。今查《高僧传》，汉、魏、晋三朝“译经”高僧共 22 人，除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有可能在浙江活动过外，其他 21 人皆无进入浙江境内的记录。两晋时期“神异”高僧共 11 人，除上虞龙山史宗活动在浙江，邺中竺佛图澄可能来过浙江外，皆无活动于浙江境内的记录。东晋“习禅”高僧共 7 人，其中剡隐岳山帛僧光、始丰赤城山竺昙猷、始丰赤城山支昙兰活动在浙江。东晋“诵经”高僧在浙江活动者有山阴显义寺竺法纯。除此之外，晋以前已有的“亡身”、“兴福”、“经师”三类高僧，无一人活动在浙江境内。

再看两晋时期“义解”高僧在浙江活动的情况。两晋时期“义解”高僧共 42 人，其中在浙江境内活动的有竺法潜、支遁、于法兰、于法开、竺法崇、竺法义、竺法旷、释慧虔等 8 人，占这一时期全部“义解”高僧的约五分之一。除长安出现了道安等 7 位“义解”高僧外，浙江剡县出现了竺法潜等 5 位“义解”高僧，为京师之外地方上出现“义解”高僧之首。总之，在浙江境内活动的高僧，除了在“习禅”方面较有特色之外，主要的特色还是在“义解”（即佛教“义学”）方面。

东晋时期佛教“义解”高僧对般若性空思想做了不同的解释，形成了各种学说流派，即所谓的“六家七宗”：道安的“本无”宗、支遁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道壹的“幻化”宗、支愍度的“心无”宗、于道邃的“缘会”宗，其中道安的“本无”宗又有别支，即竺法深的“本无异”宗。在东晋“义学”最有影响的“六家七宗”中，浙江“义解”高僧贡献了三个宗派：竺法深（即竺法潜）的“本无异”宗、支遁的“即色”宗和于法开的“识含”宗。这充分展示了浙江佛学在“义学”方面的特质，为后来浙江佛教打下了基本色调。

参考文献:

- [1]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芮沃寿.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2009.
- [3] 僧祐. 出三藏记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4] 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5] 慧皎. 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6] 浙江图书馆. 重修浙江通志稿: 第 101 册宗教[M]. 浙江: 浙江图书馆稿本, 1983.
- [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8] 白居易. 白居易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9]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